

中唐宗室与文学之家的互动^{*}

——让皇帝房后人与东平吕氏兄弟交往考

徐 畅

一、新出让皇帝后人碑志及其撰者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有开成年间《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袭魏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工部尚书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下文简称《李从易墓志》),志主李从易,为李唐宗室,“曾祖让皇帝”,“烈祖璿,秘书监,赠太子太傅”,“烈考杆,宗正、鸿胪二卿,桂州观察使兼御史中丞,赠尚书左仆射”。让皇帝,即宁王李宪,睿宗长子,玄宗长兄^①。关于其族人子孙,《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有载^②,两《唐书》本传亦有述及。对读可知,让皇帝诸子中有名可考者有琎、嗣庄、琳、瑀、珣、璗、珦、珽、琯、璫等人,此辈约生活于玄、肃两朝。

其中魏郡公琯,据西市博物馆藏《让皇帝第十一男璡母夫人韦氏墓志铭并序》,知为李宪与韦贞范之子,正是李从易的祖父。《宗室表》对璡一支后人记载阙如,据《李从易墓志》知,璡有子杆,娶河东柳氏(和政公主与柳潭女),生李从易及弟从简。

核《宗室表》,同房同辈知姓名者,还有汝阳王琎支的子昱(富平令)、子称(黝令)、子谊(太子中允),嗣宁王琳支的子漱(嗣王)、子鸿(嗣宁王),汉中郡王瑀支的景俭(谏议大夫,族中排行第六)、景儒(散骑常侍)、景信(江州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之一。文中所引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录文,皆属该项目的集体研究成果。

①《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让皇帝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09—3013页;《新唐书》卷八一《三宗诸子·让皇帝宪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93—3595页。

②《新唐书》卷七〇下《宗室世系表下》,第2136—2142页。下文简称《宗室表》。

刺史，排行十一）^①、景仁（容管经略使、左庶子，排行二十一）^②。这辈人活跃于德宗贞元（785—805）至文宗大和（827—835）中，已经到了中唐，事迹见于史书记载的不少。

《李从易墓志》更为我们提供了让皇帝房后人在中唐时婚宦的实例，志文历数其在德、顺、宪、穆、敬、文六朝的迁转，清晰翔实。值得注意的是志文由“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吕让撰”。吕让系出文学与科举世家，祖吕延之、父渭、兄温、恭，俱进士及第。吕渭早年出幕浙江，曾参与大历文人浙东、浙西联唱^③；贞元十一至十三年为礼部侍郎，曾三知贡举，“斥光华，奖沉翳，扬寒士，抑贵胄”^④。渭有四子：温、恭、俭、让，史称“皆有美才”^⑤。明胡应麟《诗薮》与胡震亨《唐音癸签》考唐人文学家父子兄弟并称者，皆举吕渭及温、恭、俭、让，允称其盛^⑥。

吕渭长子温幼从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梁肃学习文章，“天才俊拔，文彩赡逸”，文体富艳，有丘明、班固之风，所撰《凌烟阁功臣铭》、《张始兴画赞》、《移博士书》，颇为文士所赏，有文集十卷^⑦。吕恭亦“为文不坠”，“作文章咸道其志”^⑧。吕让自小蒙长兄温“亲授文章意气，经传宗旨”，“著《委纳言墓表》、《衡州合江亭记》”，应乡试，“韩吏部、皇甫郎中、张司业方闲宴，见公《贾珠赋》云：‘洞庭方员七百里，其澜浸日月，土出金入之’之句，环目惊视，不浃辰

①李六景俭、李十一景信多见于元稹、白居易诗，岑仲勉先生注意到其行第，参氏著《唐人行第录》“又李六景俭”条、“又李十一”、“又李十一景信”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38—39、第48—50页。

②《全唐文》卷七五七李商隐《上容州李中丞状》称“二十一翁”者（中华书局，1983年，第8086页），应为让皇帝房之景仁。

③参考贾晋华在《〈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与浙东诗人群》与《〈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两文中的相关论述，收入氏著《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4—94页。

④《唐故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06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77—778页。下文简称《吕渭墓志》。

⑤《旧唐书》卷一三七《吕渭传》，第3768页；《新唐书》卷一六〇《吕渭传》，第4962页；《唐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通议大夫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赠陕州大都督吕府君夫人河东郡君柳氏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059，第775—776页。下文简称《柳氏墓志》。

⑥[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第161—163页。[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41—242页。

⑦《新唐书》卷一六〇《吕温传》，第3769页。

⑧柳宗元：《吕侍御恭墓志》，《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255页。下文简称《吕恭墓志》。

传乎万人”^①。吕氏兄弟遵父嘱“先茔碑志，皆自撰述，常诫后人，必无假人，欲以传庆善于信词，儆文学之荒芜”^②，故尤善作铭诔碑赞，吕渭及夫人柳氏墓志由吕温撰、吕恭书，吕让墓志由长子涣撰、四子炫书。吕温作墓志、祭文对象及于纪国大长公主、贞元元和间名臣吏部尚书京兆尹韦夏卿、京兆尹韦武、兵部尚书顾少连、给事中陆质等^③。如此可见，《李从易墓志》正出自名家之手。

吕让为此志时，表达了颇为特殊的情感。在历数志主生平事迹后，发议论，以唐有鉴于汉分封同姓而导致内乱之弊，“先公后私，右贤左戚”，“将相自取，同于庶族”，而使得宗室萧条，多无政治作为，“唯让帝之家，英髦继有”，“唐有让王”、“传后盛胤”，对让皇帝房支的人才辈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让皇帝房为睿宗所分六房之一，在李唐宗室中恐非著房；观《宗室表》，其宗枝亦不为繁盛。从李宪开始，任官多与礼仪、宗室、学术事务相关，清而不要之部门。如李琎子杙为宗正少卿，四世孙李光符为光禄寺丞，光启为祠部员外郎；嗣宁王琳子栩为鸿胪卿，桢为宗正卿，桢子子鸿为太仆卿；魏郡公琯子杆为宗正、鸿胪二卿；汉中郡王瑀子梢为太常博士等等^④。与远房疏枝子孙登台阁、为宰辅的情况殊为不同^⑤。

吕让对让帝一族“英髦继有”的评价，不能说没有夸饰的成分，他比李从易稍后，而其兄温、恭与从易同时^⑥，让我们联想到，他本人以及中唐时由文学至宦达的吕氏家族，是否与志主乃至与志主同房同辈的其他让皇帝后人，有着现实生活中的紧密联系？中古家族维持其衣冠门第，无外乎仕宦与婚姻两途^⑦。让皇帝房四世后人成年，踏上仕途之时，也正好是东平吕氏四兄弟由科举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他们在交游、为官迁转、婚姻等诸方面会有怎样的互动？这其中宗室与新兴文学世家又分别会扮演怎样的角色？目前从事唐代宗室研究

①《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东平吕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大中 10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334 页。下文简称《吕让墓志》。

②《吕渭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 778 页。

③《吕衡州文集》卷七《纪国大长公主墓志铭》，卷六《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下文简称《韦夏卿碑》），卷六《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赠吏部尚书京兆韦公神道碑铭并序》（下文简称《韦武碑》），卷八《祭陆给事文》，《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854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76-77、第 60-63、第 71-74、第 88-89、第 87 页。《全唐文》卷六三一《祭座主故兵部尚书顾公文》，第 6370-6371 页。以下所引吕集均据源于吴本（吴茂才有堂家藏影宋钞本）之《丛书集成初编》本。

④《宗室表》，第 2136-2142 页。

⑤《宗室表》载宗室宰相 11 人，多出自远支。

⑥吕让（793-855），李从易（779-838），吕恭（777-813），吕温（771-811）。

⑦陈寅恪称“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氏著《元白诗笺证稿》之《读莺莺传》，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16 页。

的学者很少关注其社会交往与文学^①，而文学界多讨论吕温的身世与文学成就^②，并未留意其家族与宗室官僚的交往细节。这正是本文努力的方向。

二、“二王”新政^③前后的李景俭与吕温

让皇帝曾孙辈，最知名者当属李景俭，字宽中，一字致用，为汉中郡王瑀之孙，太常博士、太子中舍人稍^④之子，两《唐书》有传。据白居易诗《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以诗贺之》中“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未蹉跎”句推测^⑤，约生于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左右。《旧唐书》本传记其“贞元十五年登进士第”^⑥。而吕氏四兄弟中，吕温大历七年生，贞元十四年（798）举进士，吕恭与李景俭同岁，贞元十六年乡贡进士。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年龄、进学时间

①唐代宗室研究，集中在宗室参政、宗室管理机构以及宗室婚姻等问题上。代表性论著如 Denis Twitchett , "The Tang Imperial Family", *Asia Major* 3rd ser. 7.2, 1994, pp. 1-61; 介永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78-84页;刘思怡:《唐代宗室管理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刘智超:《论唐代前期宗室参政》,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刘思怡:《墓志所见唐代宗室之婚姻》,《唐史论丛》第1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1-317页;马思卿:《花落谁家——唐代宗室女及其婚配》,台湾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等。

②相关研究有刘德重:《吕温生平事迹考辨》,《文史》第27辑,1986年,第231-244页;赵荣蔚:《论吕温的诗歌成就》、《吕温生平及被贬真相考》、《论吕温的政治思想》、《论吕温对中唐文学的贡献》,《盐城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第25-28页,1995年第3期,第72-76页,1996年第2期,第63-67页,1999年第1期,第18-23页;赵荣蔚:《吕温年谱》,三秦出版社,2003年;多洛肯:《吕温事迹考述——吕温研究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43-49页等。近年来又有多篇硕博论文聚焦吕温,以白盛友《吕温研究》为最新之成果,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论文后附《吕温年谱》,较赵荣蔚《谱》完备,本文涉及吕温活动以此为据。

③发生在贞元二十一年的以王叔文为首政治集团的活动,以往有“永贞革新”的提法,柳思言、黄永年等学者已从不同角度揭示该提法名不符实(柳思言:《评所谓“永贞革新”》,《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23-27页;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60-71页)。此后常用的概括有“二王八司马事件”,亦有沿用“永贞革新”者,本文主要探讨“二王”集团活动,故称之为“二王”新政。

④《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景俭传》记其父褚,太子中舍(第4455页);而《宗室表》则记为“太常博士、太子中舍人稍”(第2139页)。从行辈来看,作“稍”是。另据西安南郊毕原出土《唐故京兆韦府君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志主李氏“讳挂,字潜元,五代祖、唐睿宗帝之胤也。四代祖宪,让皇帝;皇帝生秘书大监、汉中郡王瑀,汉中王瑀生殿中侍御褚”,志文录作“褚”,对照图版,实为“稍”。详参张蕴:《关于西安市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三)——逍遥公房和李夫人墓志》,《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1期,第56-61页、图三。

⑤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21-1022页。

⑥《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景俭传》,第4455页。

的还有刘禹锡、柳宗元、元稹、白居易（下文简略为刘、柳、元、白）。这群青年文人在贞元末步入政坛，激切时政，呼吁革新，掀起了中唐政治与文学生活的波澜。

其中李景俭、吕温（下文简为李、吕）、刘、柳直接加入了“二王”政治集团，促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至六月间抑宦官、罢宫市、反聚敛等一系列革除弊端、刷新政治之活动，八月，宪宗即位，改元“永贞”，随即有“二王八司马”之贬。学界对此事件之名称、性质及“二王”集团核心成员的政治背景，有过激烈争论，总希望提出一种固定模式来解释，如“代表庶族地主阶级的新兴力量”与“掌权的宦官、藩镇、豪族地主阶级旧势力”作斗争说，“唐代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内部斗争”说，“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君权与相权矛盾冲突”说^①，以及“由文学侍从而参政的东南文士利益集团与关中、山东士族之抗衡”说^②等等。

目前以胡可先南北党派分野说接受度最广，然而，“南人”并不能强塞下王叔文集团的所有骨干人物，胡可先在对其分类时列出“吴越以外士人”一类，包括韦执谊、李景俭、韩泰、韩晔、程异等（多为京兆长安人），对于他们为何能跻身“二王”集团，解释为南方寒俊需倚关中望族以提高声誉^③。但与李景俭同为李唐宗室，襄邑恭王神符的五世孙李程，贞元末在御史台，入为翰林学士，却在“顺宗即位，为王叔文所排，罢学士。三迁为员外郎”^④，并未被“二王”吸纳，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文人官僚加入“二王”集团的原因，需结合其家世、历官、交游，在贞元末的总体表现，做具体的个案分析。以往对刘、柳的分析已颇多，而最为王叔文推重之李、吕二人在新政前后的表现，值得我们借助文学与碑志材料来重新探究。

1. 李、吕与长安“新学”讨论圈

李景俭为宗室后裔，让皇帝曾孙，自小应在长安居住。而东平吕氏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县），至吕延之辈始通显，举家迁徙洛阳。大历七年（772）吕温生时，其父渭在浙西节度支使任，吕温14岁前在越中及洛阳，贞元元年（785）至五年居广陵，从梁肃学文章，与元洪讨论《春秋》大义，这期间两人可能无由会面。

贞元五年八月，吕温至长安，当时著名的《春秋》学者陆质（原名淳，避宪宗讳改）正在长安任仓部郎中。七年，20岁的吕温得直接师从其习《春秋》，见

①王芸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革新的历史意义》，《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第105—130页；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孙祥君：《论唐宪宗的“元和之治”——兼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15—22页。

②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71页。

③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第69—70页。

④《旧唐书》卷一六七《李程传》，第4372页。

其所作《祭陆给事文》：“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陆质学宗异儒啖助、赵匡，针对晋唐以来盛行《左氏春秋》，拘泥于章句注疏而隐没微言大义的状况，主张兼采三《传》以释《春秋》，并以《春秋》中包含的尧舜理想时政理念纠正现实政治中的弊端，使其符合中道^②。著作有《集注春秋》二十卷、《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集传辨疑》七卷等。其学说在当时长安的文人官僚中颇有影响，而官僚之家的青年子弟，正属读书求仕之龄，竞相讲论陆质新学，并关联时政，形成了一个长安“新学”讨论圈。

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当属陆质的嫡传弟子吕温。参与其中的还有监察御史柳镇子柳宗元，宰相韩滉弟洄子韩晔，万州刺史子南阳韩泰等，柳宗元追述：“又闻韩宣英（晔）及亡友吕和叔（温）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泰）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③柳宗元一开始不得师从陆质，对《春秋》新学的初步了解，主要来自吕温、韩晔、韩泰，从他们那里见到陆质的代表著作。柳曾回忆获道于吕温的经历，“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指吕温），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④。“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⑤。

与柳宗元相似，借吕温得以进入长安“新学”讨论圈的，应当还有李景俭，这点前人并未注意到，史书亦未提及，仅言其“性俊朗，博闻强记，颇阅前史，详其成败。自负王霸之略，于士大夫间无所屈降”^⑥，“负王佐之才，探圣人之奥，磅礴秀气，拔乎其伦”^⑦，表现与新学人物极类。而吕温元和元年曾作《同舍弟恭岁暮寄晋州李六协律三十韵》，透露了与李景俭“讨论自少小，形影相差池。比来胸中气，欲耀天下奇”的青年友谊^⑧。可知李景俭确实参与了以吕温为中心的“新学”讨论，甚至还秉持陆质新学质疑经典、经世致用的精神，有所创述，作《孟子评》。原书已佚，从友人柳宗元的介绍中，我们得以略知其内容、宗旨：

往时致用作《孟子评》，有韦词者告余曰：“吾以致用书示路子，路子曰：‘善则善矣，然昔之为书者，岂若是摭前人耶？’”韦子贤斯言也。余曰：

①《吕衡州文集》卷八，第88页。白盛友：《吕温研究》附《吕温年谱》，第123—124页。

②关于陆质春秋学的师承与理念，参考齋木哲郎撰、曹峰译：《永贞革新与啖助、陆淳等春秋学派的关系——以大中之说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48—53页。

③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集》，第818—819页。

④柳宗元：《祭吕衡州温文》，《柳宗元集》，第1053页。

⑤柳宗元：《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柳宗元集》，第220页。

⑥《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景俭传》，第4455页。

⑦吕温撰：《故唐太子舍人李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全唐文》卷六三一，第6365页。

下文简称《郑氏墓志》。

⑧《吕衡州文集》卷一，第6页。

“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而表乎世焉尔。”^①

“往时”大约即贞元中诸青年长安论学之际。李景俭所作，似颇指摘《孟子》，在友人路子、韦词中引起了争议，唯柳宗元深晓其以文明道之意，并步其后作《非国语》一篇。

贞元末，随着诸青年踏入仕途，交游圈扩大，长安新学讨论的参与人数也渐增多。如刘禹锡贞元九年第进士，十一年登博学宏词科后，入淮南幕，十八年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开始京官生涯，亦得加入讨论。本年十月前，他与蓝田县尉柳宗元、任职御史台的韩泰相邀，同访大学博士施士丐，听其讲《毛诗》，《唐语林》卷二《文学》记其事：“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丐听《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②可见新学讨论圈成员也向其他考疑经典的儒者学习。刘禹锡也记录了这一时期的新学讨论以吕温为主体：“（吕温）年益壮，志益大，遂拨去文学，与隽贤交，重气概，核名实，歆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每与其徒讲疑考要，皇王富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间，诋诃角逐，叠发连注。得一善，辄盱衡击节，扬袂顿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③

通过以上爬梳，贞元年间的长安新学讨论，参与者至少有李、吕、刘、柳、韩晔、韩泰，而其中李、二韩，正是胡可先归于无法解释立场的“吴越以外人士”。或许可以认为，他们是由长安新学讨论圈而进身“二王”集团的代表性人物。

2. “二王”新政中的李与吕

吕温贞元十四年（794）第进士，次年再登博学弘词科，而李景俭也举进士，两人几乎同时进入仕途。吕温释褐为集贤殿校书郎，而李之释褐官，史书无载，而上引《同舍弟恭岁暮寄晋州李六协律三十韵》称李景俭为“协律”。唐宗室子弟多供职于主礼仪学术的寺监，如上述，李景俭的曾祖李宪（开元九—十四年）、祖汉中王瑀（乾元二年）都曾做过太常卿，父李稍为太常博士，则此“协律”极有可能是正八品上的太常寺协律郎^④。

贞元十六年吕温居父母丧。服除后，十九年，适逢王叔文、王伾用事太子东宫，引陆质、韦执谊等重臣，并广泛吸纳新学派文人官僚。当年的长安“新学”讨论圈成员先后加入进来，组成“二王”政治集团。吕温也开始参与其活动，并

①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柳宗元集》，第823页。

②[宋]王谠撰：《唐语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0页。

③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第1059页。

④《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中华书局，1992年，第398页。太常寺为专司礼仪机构，其属员非普通士人的释褐官，常由宗室担任，如吕温《韦武碑》记其长女“适桂管观察支使太常寺协律郎陇西李允元”，李允元亦为宗室。

因王叔文推荐自集贤殿校书郎擢为左拾遗^①。

李景俭在此段行踪，史书无载，仅知贞元十九年为王叔文密结之朝中死友。李景俭是长安新学讨论圈成员，涉入以新学为指导的“二王”新政，当可解释。但他加入“二王”集团，并代表“南人”政治立场，个中原因不会如此简单，借助吕温为李景俭母所作《故唐太子舍人李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提供的细节信息，李参与新政的另外一些背景浮出水面。

志文记李景俭母荥阳郑氏“大父，正议大夫金衢二州刺史。严考钦英，朝议郎杭州别驾”，也就是说景俭的母系家族郑氏两代出仕吴越，而外祖父郑钦英为杭州别驾，其母也有可能出生在杭州。而荥阳郑夫人在其夫太子中舍人李梢过世后教育诸子，“而时命不偕，与善茫昧，景俭有捧檄之役，夫人从养于越州，以贞元十九年终于官舍，降生五十有四”^②，可推测景俭为母出仕，在协律郎任满后，第二任官选择远在浙江东道的越州，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或出其母意志。

李景俭在越州任何职？略作推测。景俭母子约于贞元十八至十九年在越（贞元十九年母终于官舍）。史载贞元十八年正月常州刺史贾全转为浙东观察使，而凌准为其判官^③，李景俭宦越，极有可能是入贾全幕，与凌准为同僚。又须注意，此凌准正是王叔文在越中故交，在“二王”新政中为翰林学士，“独抗危词”，力主顺宗继位，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后贬和州、连州，早卒^④。李景俭与凌准的两年同僚，也为他身为陇西李氏宗亲，却能进入二王组织的南人集团作了重要铺垫。

“二王”集团组成了一个大的交往圈，《旧唐书·王叔文传》记其“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⑤。其中，李景俭与吕温又是王叔文最为看重的俊才，《王伾传》记“王叔文最所重者，李景俭、吕温”^⑥，韩愈《顺宗实录》称叔文“最所奇才者吕温”、“最所贤重者李景俭”^⑦。

然而新政实施当时，王叔文集团分工合作，“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谊承奏于外。与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倜然自得，谓天下无人。”^⑧独不见李、吕

①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 1059 页。

②《全唐文》卷六三一，第 6365 页。

③《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第 396 页。

④胡可先：《凌准考》，《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第 317—321 页。

⑤《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第 3733 页。

⑥《旧唐书》卷一三五《王伾传》，第 3736 页。

⑦韩愈撰、李翱述：《顺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5 页。

⑧《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第 3734 页。

二人。《新唐书》记“时景俭居亲丧，温使吐蕃”^①，吕温撰《郑氏墓志》，景俭母贞元十九年十一月卒，由越中奔洛居丧；而吕温贞元二十一年五月与工部侍郎张荐出使吐蕃，被羁留未回，是年八月宪宗继位，有“二王八司马”之贬，李、吕二人幸运地避免了外贬。然而贞元之事，无疑在其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埋下了隐患。

3. 李、吕的贬谪及谪居中会面

宪宗即位后一月，永贞元年九月，吕温至吐蕃回，“二王”集团成员俱已外贬，陆质不久亦病卒。吕温除户部员外郎，病三月，元和元年转司封员外郎，在长安。李景俭在洛阳服除后，被好接贤纳士的东都留守韦夏卿辟为从事，吕温撰《韦夏卿碑》，言其“分正东郊，开府辟土，则有今右司郎中敦煌段平仲、仓部员外郎安定皇甫镈、礼部员外郎清河张贾，洎京兆尹韦词、陇西李景俭、中山卫中行、平阳路随，皆群彦之秀出，一时之高选，可以观其所任矣”^②。约元和元年，李景俭除为晋绛观察从事。年底，吕温与弟恭同在长安^③。时近岁暮，夕阳西下，月上南枝，霜凝楼台，冰封池榭，吕氏兄弟面对庭院中的寒冬景致，想起了远在晋州的旧友，追忆着青年时意气用事的岁月，由于“早行多露悔，强进触藩羸”，而至“几年困方枘，一旦迷多岐”，但仍期待着友人能早日返回政治中心，畅想并相约“明年郊天后，庆泽岁华滋。曲水杏花雪，香街青柳丝”的长安之游^④，挥笔成三十韵之排律。吕温工七绝，排律尤少，此作绝无仅有，情谊颇深。

元和二年，窦群为御史中丞，辟吕温为侍御史知杂事，羊士谔为御史，并引李景俭为监察御史^⑤，李、吕二人果得在长安相聚，同领宪衙。时间不长，据《吕温传》载，时窦、吕、羊与宰相李吉甫有隙，密奏其夜召术士于宅第事，宪宗不采，将三人贬官。元和三年十月吕温贬均州，寻改道州^⑥。同贬的当然还有李景俭，“（窦）群以罪左迁，景俭坐贬江陵户曹”^⑦。三年底，李、吕两人沿长安——荆襄道偕行，至江陵，两人辞别。《吕衡州文集》中有《江陵酒中留别坐客》诗，应是赠景俭：“寻常纵恣倚青春，不契心期便不亲。今日烟波九疑去，相逢尽是眼中人。”^⑧吕由荆州过洞庭，经岳州，至道州，转年正月至道州刺史任。

①《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第5121页。

②《吕衡州文集》卷六，第63页。

③据柳宗元《吕恭墓志》，恭吕贞元末在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幕府，因意见不合，“以试守军卫佐加协律郎，入荐为长安主簿”，元和元年应在长安主簿任（《柳宗元集》，第256页）。

④吕温：《同舍弟恭岁暮寄晋州李六协律三十韵》，《吕衡州文集》卷一，第6页。

⑤值得注意的是，窦群与“二王”集团为敌，却与其中李、吕二人颇为厚密，个中原因，胡可先有辨析，见《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第390—394页。

⑥《新唐书》卷一六〇《吕温传》，第4967页。

⑦《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景俭传》，第4455页。

⑧《吕衡州文集》卷二，第15页。

元和三年至九年，李景俭在荆州六年，而元和五年六月元稹至江陵士曹参军任，此后五年，李与元同宦江陵，建立了亲密友谊，此前人已论及^①，不赘。而吕温在道州一年余，元和五年五月转衡州刺史，七月到任，元和六年早春在衡州染病^②。这段时间，二人是否再见过面？吕温、恭兄弟与李景俭有题为《道州春日感兴》的联句：

始见花满枝，又看花满地。（李景俭）

且持增气酒，莫滴伤心泪。（吕温）

深诚长郁结，芳晨自妍媚。（吕恭）

嘯歌聊永日，谁知此时意。（李景俭）^③

属于流连光景、伤时感事的小碎篇章，为“元和体”之典型。因吕温在道州从元和四年正月至元和五年五月，历两春，故是诗或作于四年春，或五年春。时李景俭在江陵，而吕恭在江西观察使韦丹幕，可能分别从两地至道州与吕温相聚。

另《吕衡州文集》中有《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④“宽中”恰与李景俭字同，岑仲勉先生即以此为吕温寄李景俭诗^⑤，那是否意味着李景俭与吕氏兄弟在衡州另有一次会面呢？细考其地域、时间，似非如此。

寻真观，在衡州府，“石鼓书院，在府城北。石鼓山旧为寻真观，唐元和间士人李宽结庐读书其上，刺史吕温尝访之，有《题寻真观李秀才书院诗》。宋至道三年，郡人李士真援宽故事，请即故址创书院，以居衡之学者。”^⑥而同在石鼓山上的名胜还有合江亭。唐贞元中衡州刺史齐映建，永贞元年韩愈曾游，有《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诗^⑦。吕温为衡州刺史时，常至合江亭游玩，见于吕集的记游诗就有《衡州岁前游合江亭见山樱蕊未折因赋含彩吝惊春》及《合江亭槛前多

①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又李六景俭”条，第38—39页；吴伟斌：《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南京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第32—39页；陶敏：《柳宗元诗中“李元二侍御”解》，原载《湘潭师专学报》1980年3、4期合刊，收入氏著《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170—176页。

②白盛友：《吕温年谱》，第147—148页。

③《吕衡州文集》卷二，第21页。

④《吕衡州文集》卷一，第6页。

⑤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又李六景俭”条，第38—39页。

⑥《湖广通志》卷二三《学校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3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7页。吕温诗中之李秀才名“宽中”，而宋人朱熹以其名“李宽”，《衡州石鼓书院记》，《晦庵集》卷七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5册，第650页；明清方志或记为“李宽中”，如《明一统志》卷六四《衡州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73册，第355页。

⑦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72—273页。

高竹不见远岸花客命翦之感而成咏》等^①。李宽中秀才结庐读书，正在此地，也就是说，此诗应为吕温衡州刺史任上所作。而诗题作“同恭夏日”云云，即此诗写作时，吕温弟吕恭亦在衡州。吕温元和五年五月转衡州，时恭在江西，八月，韦丹卒，表恭为桂管部防御副使兼殿中侍御^②。六年四、五月中，吕俭、恭皆至衡州，与温、让团聚，并送恭南行，见于吕集有《宗礼欲往桂州苦雨因以戏赠》、《喜俭北至送宗礼南行》诗^③。吕温、恭访寻真观李秀才书院，当在此年夏，而此时李景俭为宦江陵，应当没有心思来衡州攻文字。检元《集》可知，本年春夏之际，李景俭确在江陵，并为元稹卜安仙嫔为妾^④，故吕温诗中之李宽中应为衡阳府本地人，与李景俭无关。

元和六年上半年，吕温病。四兄弟相聚后不久，八月，吕温在衡州去世，“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这个消息引起士林悲恸，且吕温在道、衡二州颇有政绩，“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乡饮酒，是月上戊，不酒去乐，会哭于神所而归。”^⑤这也意味着，自元和三年底同遭贬谪携手南行后，李、吕仅有过一次短暂会面。

吕温卒，“二王”新政中的同道们，皆有诗哭之。在朗州的刘禹锡有《哭吕衡州时予方谪居》一首，并于十年后，遵温子安衡嘱，整理其遗稿，作《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⑥。在永州的柳宗元撰写《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及《祭吕衡州文》，并作《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诗，同时寄予刘禹锡、李景俭、元稹三人，末联“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⑦，想象李、元二人在江陵如何为吕温扼腕。可以推测，祭吕温是刘、柳、李、元四人的集体活动，他们相约同时赋诗追悼，并将诗作分别寄予另外三人。在江陵的元稹有《哭吕衡州六首》^⑧，元稹并未参与“二王”新政，与吕温交谊多借同在一处的李景俭^⑨，则李景俭亦必有诗追念当日长安“新学”讨论圈、“二王”政治集团以及窦群御史台中旧友，惜已不存。

三、李从易父子与吕让的交往

让皇帝房李氏兄弟与吕氏兄弟的交往，不止李景俭与吕温、恭一段故事。

①《吕衡州文集》卷一，第15—16页。

②《吕恭墓志》，《柳宗元集》，第256页。

③《吕衡州文集》卷一，第10页；卷二，第14页。

④元稹：《葬安氏志》，杨军主编：《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

⑤柳宗元：《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柳宗元集》，第217页。

⑥《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第1057—1060页。

⑦《柳宗元集》，第1155—1156页。

⑧杨军主编：《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417—422页。

⑨参考吴伟斌：《元稹与永贞革新》，《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第50页。

再回到《李从易墓志》，细绎魏郡公琯支与东平吕氏的关系。墓志记从易父李杆为“宗正、鸿胪二卿，桂州观察使兼御史中丞”，但未交待任职时间。郁贤皓、胡可先以为李杆贞元末为宗正卿^①。从永贞元年十一月为德宗崇陵事毕而下《崇陵优劳德音》中，可见到李杆为“按行山陵地副使”，参与德宗山陵事，其时应在宗正或鸿胪卿任上^②。而《白氏长庆集》中保留有其代拟之《答李扞（杆）等谢许上尊号表》、《答李扞（杆）谢许游宴表》。据《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二年十二月“丙子，令宰臣宣敕：百僚游宴过从饯别，此后所由不得奏报，务从欢泰”^③以及两《表》中言“朕自临万邦，仅经三载”语^④，可知李扞上表在元和二年底，其时尚在京。

据《李从易墓志》，其年未弱冠出仕，起家左金吾卫骑曹参军，转京兆三原县尉，适逢顺宗去世，丰陵役起，“公知本县顿递”，此时应为元和元年（805）。后选大理寺主簿，“三考秩满，随侍桂岭”，此任年满时正是元和四年，李扞应当在这时除桂州观察使。据戴伟华考证，桂管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元和五年至八年任职者为“李？”^⑤，名不详^⑥，对照《李从易墓志》，正是李扞。

这又牵扯出另一个重要细节，上节述及，吕温弟恭元和二、三年至五年为江西观察使韦丹之僚佐，元和五年八月韦丹去世，吕恭为其料理丧事，见韩愈撰《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元和五年……明年七月……将葬，其从事东平吕宗礼与其子寘谋曰：‘我公宜得直而不华者铭传于后，固不朽矣。’来请铭。”^⑦而据柳宗元《吕恭墓志》，韦丹卒前“表（吕恭）进殿中侍御史，为桂管部防御副使”。吕恭元和六年夏在兄温处，兄弟团聚，准备南行，正是要到桂州去，做李扞的幕僚。或许由于兄温丧事，元和八年方“去桂州，相国尚书郑公遮留，假岭南道节度判官。至广州，病疹症加，六月二十八日卒”^⑧。

吕恭虽未入李扞幕，但与其家当有交往，并可能于卒前促成胞弟让^⑨与李扞女的婚事，见于《吕让墓志》：“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外王父桂府观察使、宗正卿、魏国公扞泣训诸子，称家卒事。”^⑩吕让贞元九年生，元和十年举进士，在此之前与李扞女结合，正合情理。

李扞诸女情况，《李从易墓志》提及其有姊，言“长姊寡居，奉邻色养，悌之

①郁贤皓、胡可先著：《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②《全唐文》卷五五，第602页。

③《旧唐书》卷一五上《宪宗上》，第423页。

④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3268、3280—3281页。

⑤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79—580页。

⑥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下册，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⑦《柳宗元集》，第256页。

⑧据《柳氏墓志》，吕温、俭、泰（早夭）为一母所出，而吕恭、翼翼（早夭）、让为吕渭嫡夫人柳氏所出。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775页。

⑨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2335页。

难也”。近刊《唐京兆府功曹参军庾府君夫人李氏墓志铭》，志主李氏，曾祖太尉宁王，“祖讳瑄，皇任秘书监，赠吏部尚书。考讳杆，皇任桂管观察使、宗正卿，赠左仆射。皇妣河东郡太夫人柳氏。夫人仆射之第二女”，嫁与庾承欢^①。由志文推李氏生于大历十年（776），比李从易年长。则李从易上至少有二姊。吕让小李从易14岁，故其所娶应为李杆小女，李从易妹，为李从易之妹婿。

吕让进士及第后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十三年至长庆元年由鄂岳观察使李程幕转邠宁节度使高寓霞幕府，宝历二年至开成四年间长期被李程辟为僚属，转北都、宣武、河中、山南东道数地，志文称“佐三府，倅三镇”^②。而李从易随父由桂还京后，历秘书省秘书郎、京兆士曹、宗正丞、将作少监、宗正少卿、左金吾卫将军，大和七年六月除桂管观察使，再入桂，大和九年四月为广州刺史，开成元年（836）十一月，卒于广州。

开成三年四月，当李从易归葬京兆三原县祖茔时，吕让恰在山南东道节度使幕，《吕让墓志》记“时彭原公镇大梁，以军司马留公，改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③，这与《李从易墓志》记其列衔“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一致。他为妻兄撰写墓志，追述其生平，并同时想到了贞元、元和中兄吕温、吕恭与李从易族兄、让皇帝房四世孙李景俭同学切磋，激切时政，同遭贬谪，诗酒相慰的深厚友谊。其时距他们先后辞世已二十馀年，但往事如昨，“二王”新政之激扬岁月犹在，吕让在挥笔千言中，对让帝之家的“英髦继有”、“传后盛胤”，给予了深情地赞誉。

四、后论

吕让在《李从易墓志》中描述了宗室在中唐社会的生活情况：“宗室才杰，多从乡赋，将相自取，同于庶族。”这与《宗室表》序所记录的“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远亲尽，则各随其人贤愚，遂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至或流落於民间，甚可叹也”^④之状况如出一辙。

唐建国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人口增长，费用冗滥，血缘亲族关系越来越疏远，初盛唐时那些亲王、郡王、近支宗室们的后代早已出皇祖免亲之范围，国初的封爵也很少能保留，沦为远支。与祖上的显宦贵姻相比，他们的生活正需重新定位。

①岳连建、柯卓英：《唐京兆府功曹参军庾承欢夫人李氏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第93—95页。

②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2335页。

③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2334页。

④《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上》序，第1952页。

在仕宦方面，他们不能直接获得官职，而需借由资荫^①或科举之途出仕，为了保持对达官显宦的占有，越来越多的宗室疏属选择与普通士人一样参加科举考试^②。让皇帝房汉中王瑀支的李景俭、景信、景仁兄弟，皆进士及第；太宗六代孙、曹王成皋子李道古，“以进士举及第，献《文輿》三十卷，拜校书郎集贤学士”^③；雍王绘之后，淮阳王道明五世孙李邢，祖上四世“官不过县令州佐，然益读书为行，为士大夫家”，李邢少孤，至五、六岁“不复与群儿戏，常默默独处，曰：‘吾独无父母，不力学问自立，不名为人！’年十四五，能闡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凡百馀万言，凜然殊异”，养七男，皆进士^④。这正是远支宗室通过科举延长政治影响，维系门第的典型例证。

入仕之后，这些宗室的迁转之路与普通士人并无太大区别，一改近支多处闲散之司的情况，多有理繁剧之务，树政绩者。为官之地也不仅局限于两京，与官僚之家子弟一样，游弋各节度使幕府，或被贬谪，行迹遍及全国，甚至远至桂、岭。这从李从易辈经历中可知一斑。也就是说，他们已完全融入帝国官员选拔、迁转网络中了。这个过程，使他们得以走出两京，走出先祖在长安坊里的宅第，走出他们的禁锢生活，参加普通文人的宴集，与全国各地的官僚交往，交游圈得到极大的扩展。让皇帝房有倾慕文学之传统，故三世文学的新兴山东士族吕氏^⑤，得以成为其结交的对象。

在婚姻方面，唐前期宗室婚姻对象集中在关陇贵族及皇亲国戚，而肃宗以后，中古以来的世家大族，包括山东士族都成为通婚对象。远支宗室与山东士族通婚很常见，还有与广陵、河内等全国各地家族为婚者^⑥。从让皇帝房来看，李从易姊婚新野庾氏，妹婚东平吕氏，这两家皆不属中古世家大族，甚至不包括在毛汉光所列中古六十家重要士族名单内^⑦，但皆有文学家传，并在近三世之内有显宦。李从易六女，次适天兴吴季质，天兴吴氏亦非望姓。可见在远支宗室，尤其是宗女婚姻中，门第重要性有下降趋势，一些其他因素凸显。

对中唐让皇帝房后人与东平吕氏兄弟关系的爬梳，提供了陇西李唐皇室之疏支与通过科举重振门第的山东士族发生联系、交往的实态。这只是一则个案，关于唐代宗室的生活、交往，宗室与文学，还有更多的话题等待我们去开拓。

①据《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所记“叙阶之法”，唐代门荫入仕包括封爵、亲戚、资荫三种标准，资荫即据其父祖身份和官品高低，叙以不同品阶（第62页）。

②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34—364页。

③《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注释》下册，第2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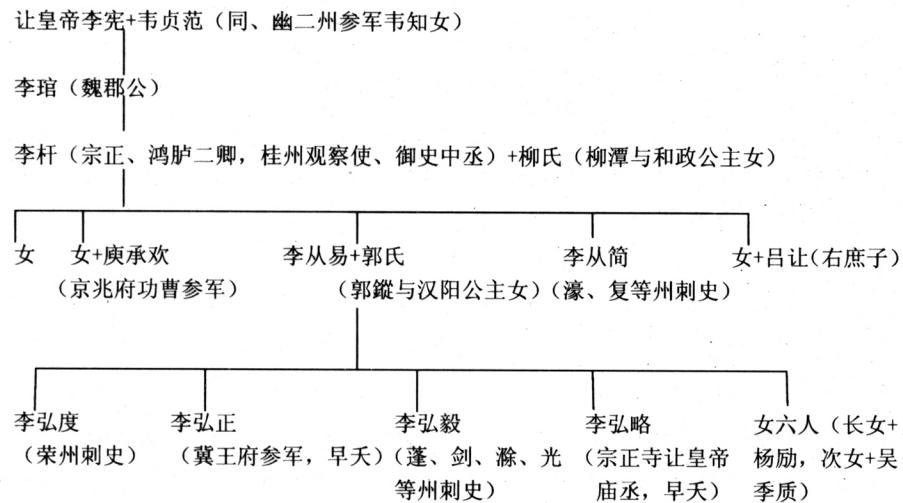
④《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注释》下册，第293页。

⑤吕氏贯河东，但郡望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吕氏兄弟皆自称“东平吕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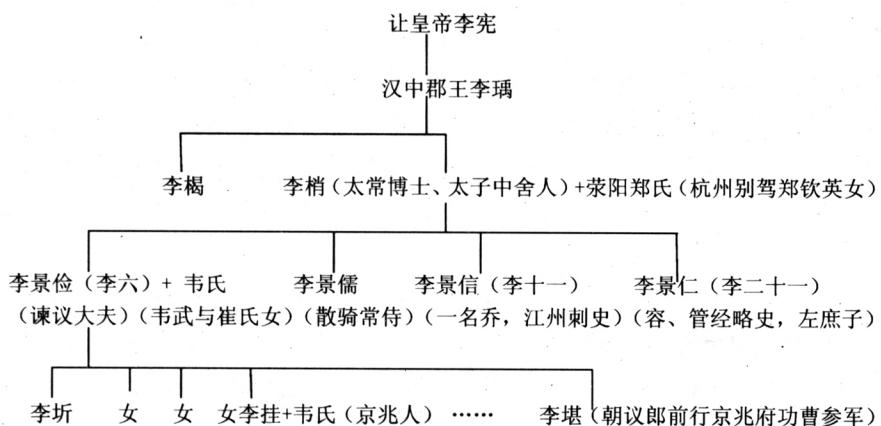
⑥刘思怡：《墓志所见唐代宗室之婚姻》，《唐史论丛》第13辑，第311—315页。

⑦毛汉光：《中国中古史论》第三篇《中古家族之变动》，第59—60页。

附表一：让皇帝房魏郡公璫支世系与婚姻



附表二：让皇帝房汉中郡王璫支世系与婚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